

# 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

童 玮 方广锡 金志良

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一九七九年在云南图书馆发现的部分版本不明的元刻藏经作了考证，指出它不是传闻已久的《弘法藏》，而是一部从未见著录的元代官刻大藏经。认为该藏经是由元太后（卜答失里）发起，于天历三年（1330）至至元二年（1336）间在大都刊刻的。同时还对这部藏经的刊刻背景作了一些探索。

作者童玮，191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方广锡，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金志良，1951年生，云南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人员。

在《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sup>①</sup>一文中，我们叙述了该藏的发现经过，介绍了该藏的一般情况，并说明它不属于我们已知的任何一部藏经。本文则拟对该藏作一些具体的考证。考证分两部分：首先论述它并非争议中的《弘法藏》，其次考证它的刊刻时间、地点、刊刻发起人等有关问题。

板印大藏经，始于宋之《开宝藏》。宋、辽、金期间，共铸板八付，即《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藏》及《磧砂藏》。上述诸藏或存或佚，但它们的来龙去脉都已比较清楚了。唯有人元以后究竟铸过几付经板，至今仍含糊不清。明紫柏大师在为《径山藏》所撰的《刻藏缘起》中说：“元板（藏经）亦不下十余付”。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宋、辽、金、元全部藏经之数，不知由何而来。吕澂先生《佛典泛论》述及明藏时说：“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板，时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板七、八付悉毁”<sup>②</sup>。这七、八付元板详情如何？惜吕先生语焉未详。在《佛典泛论》中提到的元藏，仅《普宁藏》一种。叶恭绰先生《历代藏经考略》<sup>③</sup>提到的元藏，为《普宁藏》与《弘法藏》。周叔迦先生《大藏经

① 见《文物》1984年第12期，第82—86页。

② 《佛典泛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二版，第30页B。

③ 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

雕印源流纪略》<sup>①</sup>则提到《普宁藏》、《弘法藏》及英宗《铜板大藏经》三种元藏。我们现在的考释工作，是在上述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次发现的元刻藏经之非《普宁藏》，自不待言。由于这次发现的元藏是木版而非铜版<sup>②</sup>，故它非英宗之《铜板大藏经》也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它是否如于乃义先生所说<sup>③</sup>是《弘法藏》呢？

提到《弘法藏》，则如叶恭绰先生所说：“元之《弘法藏》究为何物，向是一谜”<sup>④</sup>。在此，想略费笔墨把过去关于《弘法藏》的讨论简述一下。这个问题讲明了，我们所考证的这部元藏是否《弘法藏》也就清楚了。

在元世祖敕命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目》（以下简称《至元录》）中有“弘法人藏录及拾遗，编入经律论，七十五部，一百五十六卷”<sup>⑤</sup>的说法。在影印《磻砂藏》所收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校刻之《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所附题记中也提到“详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磻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讐”之事<sup>⑥</sup>。因此，不少人认为当初确曾存在过一部《弘法藏》，它是元世祖至元年间在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刊刻的。

三十年代，支那内学院蒋唯心先生在清理了山西赵城广胜寺所藏崔法珍募刻的《金藏》之后，发表了著名的《金藏雕印始末考》。文章以大量的史料论证了《金藏》（即世称《赵城藏》者）与《弘法藏》的关系，提出山西《金藏》后输版入京<sup>⑦</sup>，贮于大都弘法寺，元代予以补雕而称之为《弘法藏》。蒋文史料翔实，考证精当。此说一出，即为多数人拥护。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关键在于元代补雕的规模有多大？是否足以使《赵城金藏》蜕化而成为一部新的《弘法藏》？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根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记载：元世祖曾因“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sup>⑧</sup>，另外《至元录》序言中“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番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sup>⑨</sup>，由此看来，所谓《弘法藏》确系《金藏》补雕而成。且认为，从上述记载看，“可以证实元世祖首先是把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印本有毁损者进行补写，没有编入的典籍书写补入，并且对这一部分（即弘法人藏录经籍）还刻了经板流通，但没有提到雕造全部大藏经的事。足见《弘法藏》的存在，并无其事。所谓《弘法藏》实际上仅是《赵城

① 载《现代佛学》1954年4月号、5月号。

② 如《元代官刻大藏经》一文所述，这批藏经中的第3、4两号经出自同一版片，但版框大小不一，说明系木版干燥缩小所致。则该藏本系木版，是十分显然的。

③ 见《元代官刻大藏经》一文所引于乃义先生卡片。

④ 见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一文。

⑤ 《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181页B。

⑥ 转引自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载《现代佛学》1964年第2期第18页。

⑦ 对于《赵城藏》输版入京之事，蒋唯心当时只是个推测。后宿白教授发现北大图书馆所藏缪荃孙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卷七所引《元一统志》载有：“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1181）以经板达京师。……以弘法寺收贮经板，及弘法寺西地与之”。完全证实了蒋氏的推测（见宿白：《赵城金藏与弘法藏》）。

⑧ 大正藏，卷49·724B。

⑨ 《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180页A。

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补本”。①周叔迦先生也说：“昔时不知有《金藏》所以只知有《弘法藏》，而不得其传本。今既发现《金藏》，则昔时所称之《弘法藏》应即是指《金藏》而言，未必另有其板”。②总之，这一观点认为《金藏》虽经补雕，但不足以使它成为新的大藏经。只因过去不知有《金藏》，故以《弘法藏》之名而混淆视听。今既知《金藏》，则《弘法藏》名不正，言不顺，也就不应再有此名。

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金藏》自补雕后，已卓然独立，足以形成为《弘法藏》。叶恭绰先生说：“元之《弘法藏》，究为何物，向是一谜。且有疑根本无是物者。今经考证，蒋唯心氏所主张元《弘法藏》即根据金之《弘法藏》所增修，而金之《弘法藏》即新近发现之《赵城藏》，其说具有依据”。“余不否认《赵城藏》即金之《弘法藏》，及元之《弘法藏》即据《金藏》增修”。但叶氏认为：“《赵城藏》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输至京师后，就曾经增补，‘北宋在汴经板，本甚繁夥，金得汴后，合崔版而成藏，本意中事’③。入元后，这付经板又迭经增补，故有赵壁《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之‘至元法宝刻在京邑’之语④，及耶律楚材之诗文。⑤‘是元在燕京曾刻汉文大藏，无可怀疑’。叶氏认为，《金藏》自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输版入京到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前后历时近百年，增易不少。他着重指出：“《至元法宝录》之经目与《赵城藏》不同，……今不妨假定《至元法宝录》之目即为《弘法藏》之目，而承认《弘法藏》之确有是物。借尚无实物可以提证”。⑥他并根据《至元录》判断《弘法藏》的镌时为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摺装本，1654部，7182卷。⑦叶氏这一观点，亦为不少研究者赞同。⑧

这样，对《弘法藏》的考证就转化为对《至元录》的评价。也就是说，元代究竟有没有一部与《至元录》相符的大藏经？宿白教授说：“‘至元法宝’盖即元《弘法藏》之别名，故……云：……‘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间”。“是说者多谓《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之目录，当可信从”。⑨这是认为有一

① 童玮：《大藏经》（油印稿）。

② 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载《现代佛学》1954年5月号。

③ 叶文引赵子砥《燕云录》：“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尽为攘夺。又取图籍文书与其钱板借行。当时下鸿胪寺取经板一千七百片”。指出：“是金取北宋经板以归于燕，确有其事。宋亡吴越而取其经板，金亡宋又取之，元亡金又取之”。

④ 周南端《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八，所录赵壁《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我元西域异书种种而出，帝师国师译新采旧，增广其文，名以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间”。

⑤ 《辨伪录》卷五：“大元启祚，瞻意法门。太祖则明诏首班，弘护兹道；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元史》卷一：“太宗八年丙申(1236)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耶律楚材《湛然文集》甲午(太宗六年)，丙申(太宗八年)诸作间，有《补大藏经版疏》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

⑥ 凡引叶恭绰先生文，均见《历代藏经考略》。

⑦ 《至元录》收经的卷数，部数，据周南端《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八录赵壁《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载为1440部，5586卷。据《至元录》卷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两者相同。前述于乃义先生卡片录《弘法藏》的卷数，即据此而来。但《至元录》的实收部数，据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所收《至元录》统计，则为1644部，7182卷。叶氏之说即据于此。宿白教授对此有专文考证。恕未见。

⑧ 杨曾文：《佛教经录与大藏经》，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⑨ 宿白：《赵城金藏与弘法藏》，载《现代佛学》1964年第2期。



部与《至元录》相符的藏经,即《弘法藏》。童玮同志认为:《至元录》的编定,“可能在当时是打算用来刻造元代官版大藏的。但未付诸实现。由于曾有过弘法人藏录的编辑,导致了《弘法藏》存在之说”。<sup>①</sup>这是认为并不存在一部与《至元录》相符的藏经,即《弘法藏》。

当年,叶恭绰先生论到《弘法藏》时,曾感慨地说:“惜尚无实物可以提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一部新经,它的编次与《至元录》完全相符,那就可以肯定元《弘法藏》的存在,否则,就不能肯定《弘法藏》一定存在。那么此次发现的元代藏经是否与《至元录》相符,从而结果这一桩公案呢?这只要将这一批藏经与《至元录》作一对照就可明白。下表(见本文后)是这一批元刻藏经与《至元录》及我们已知的宋、辽、金、元历代藏经的千字文编次比较表,从下表可以看出,这批元藏与《至元录》不符,因此不可能是所谓的《弘法藏》;同时,它与我们已知的宋、辽、金、元所有大藏经的编次均不相符,确是一部佚亡已久,过去从未见著录过的大藏经。

## 二

这批元代官刻藏经附有三份珍贵的题跋资料,是我们考证其刊刻时间、地点等问题的主要依据。在此,先将这三份资料抄录如下:

### 一、太皇太后愿文:<sup>②</sup>

“赞天开圣仁寿徽懿宣昭贞文慈祐

储善衍庆福元

太皇太后

窃念荷

祖宗之德

社稷之灵海内乂宁军国多暇永惟

罔极徒切孝思爰阐

佛乘少酬

景贶於是印施

三乘圣教经律论贤圣集凡三十

藏庶众善所积百福威臻伏愿

皇帝万岁

太子千春圣子神孙同膺上寿尚希

余庆施及遗黎均蒙

覆育之仁共乐无为之化

至元二年岁次丙子四月吉日誌”。

(见封二)

① 童玮:《大藏经》(油印稿)。

② 小野玄妙的《佛教经典总论》抄录了这份愿文,内容与此完全相同。但将“乂”字错为“人”字。

二、僧名录：<sup>①</sup>

“通玄妙济大师大法藏寺住持 用柔  
 对经讲主大法藏寺提点释 德太  
 对经讲主大法藏寺都寺僧 智妙  
 对经讲主大普庆寺沙门 智通  
 对经讲主晋宁路曲沃县大悲寺住持 明赞  
 对经讲主东昌路聊城县铁佛堂沙门 余通  
 对经讲主晋宁路解州安邑县罗汉院僧 满闾  
 对经讲主西坡居士涂 安国  
 铨经讲主大普庆寺沙门 惠明  
 铨经讲主真定路赵州高邑县慈云院僧 妙千  
 铨经讲主 隆吉祥  
 铨经讲主袁州路报恩寺沙门 继灯  
 铨经讲主弘法寺沙门 净瑜 德彦  
 铨经讲主弘法寺沙门 云泽 明辨  
 铨经讲主宁夏路大护国仁王寺沙门 智福  
 铨经讲主 法琼 兴添  
 铨经讲主 德琛 如释  
 铨经讲主 惠濬 能吉祥”。 (见封二)

《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一文中我们已交待，这份僧名录系从左向右直行书写，抬头渐次降低。最左边的“用柔”一行尚未顶格。可见左边还有部分地位较高的僧人名款失落。

## 三、职名录：

“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使侍正昭功万。

户部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

大学士领学士院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恩扈卫

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钦察

亲军都指挥使司官相都总管府事领太禧宗祿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 伯颜

银青荣禄大夫御史大夫 撒迪

光禄大夫徽政使领甄用监中书平章政事虎符提调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八赤吉儿千户所达鲁花赤 孛罗

金紫光禄大夫赵国公徽政使 常不兰奚

荣禄大夫徽政使延庆司使提调掌谒司事郑秃满达儿

① 小野玄妙的《佛教经典总论》抄录了这张僧名录，内容与此完全相同。但将“余通”错为“余通”。

荣禄大夫徽政使 上都  
 资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 自当  
 荣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侍正 赵世安  
 资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领掌医监事 答儿麻室利  
 中奉大夫徽政院付使 答儿麻失监  
 中奉大夫徽政院付使兼群牧卿 张乞驴  
 朝散大夫金徽政院事 高郎  
 奉议大夫金徽政院事甄用卿 察鲁  
 奉训大夫同金徽政院事 朵安术  
 嘉议大夫同金徽政院事 伯颜忽都  
 朝散大夫参议徽政院事 答失蛮  
 奉议大夫参议徽政院事 张文焕  
 承务郎徽政院经历 锁住  
 朝散大夫徽政院经历 赵礼  
 奉政大夫徽政院都事 程良杰  
 奉训大夫徽政院都事 蛮子  
 中宪大夫徽政院都事 刘瓚  
 儒林郎徽政院都事 杨必识温  
 正议大夫延庆司使 火儒赤  
 儒林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员外郎 蛮子海牙  
 朝列大夫延福提举 汝奴班  
 从仕郎延福同提举 答儿麻新  
 徽政院椽史 赵国忠  
 徽政院宣使 张士毅  
 登仕郎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知事 张庭兰  
 承务郎卫候直都指挥使司知事 杨德实  
 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提控案牍 杨遵  
 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提控案牍 杨珪  
 奉直大夫内宰司丞 李仲信  
 承事郎内宰司典簿 王汝弼  
 收支诸物库大使 阿都赤  
 收支诸物库付使 于允  
 昭信校尉析成局大使 苏重儿”。

小野玄妙的《佛教经典总论》也抄录了这张职名录，也是38人，但与上述职名录有所不同。没有上都、自当、张乞驴、朵安术、伯颜忽都、答失蛮、张文焕、刘瓚、杨必识温等九人，而代之以下列九人：

金紫光禄大夫徽政使宫相都总管府都达鲁花赤提调甄用监□□伯撒里（位列于撒迪

之后)；

荣禄大夫徽政使同知昭功万户都总使府事提调中兴武功库 张住董 (位列于郑秃满达儿之后)；

荣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甄用监卿 宋难 (位列于张住董之后)；

亚中大夫金徽政院事 定僧 (位列于高郎之后)；

奉训大夫同金徽政院事 董阿出 (位列于察鲁之后)；

中宪大夫参议徽政院事 不花 (位列于董阿出之后)；

朝散大夫参议徽政院事 蔡受益 (位列于不花之后)；

承德郎徽政院都事 洪文 (位列于赵礼之后)；

奉直大夫徽政院都事 李思齐 (位列于蛮子之后)。

还有三人官衔不同：

答儿麻室利，作：“通奉大夫徽政付使领掌医监事”；

答儿麻失监，作：“徽政院付使”；

察鲁，作：“奉训大夫同金徽政院事”。

一人官衔，排位俱不同：

孛罗，官衔作：“资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位列于赵世安之后。

此外，还有六处小差异，看来系抄录时的笔误，兹不录。<sup>①</sup>

从上述两份职名录<sup>②</sup>中可以看到，38名官员中有24名领有徽政院衔<sup>③</sup>，尤其在前23位地位较高的大臣中，领有徽政院衔的就有22名。徽政院，是元代专司太后事务的机构。由此说明这部藏经的刊刻与愿文中的太皇太后有密切的关系。在此，简略介绍一下这位太皇太后是十分必要的。

这位太皇太后名卜答失里(1306——1340)系元文宗的妻子。元朝后期，宗室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她也是漩涡中的人物。天历二年(1329)八月，文宗在王忽察都谋杀了哥哥明宗，夺位自立。<sup>④</sup>其后，卜答失里害死了明宗皇后八不沙。<sup>⑤</sup>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逝世，临终遗言：“昔日王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立明宗之子，使绍兹大位，则朕见明宗于地下，亦可有辞以对”。<sup>⑥</sup>卜失答里秉文宗遗愿，先立明宗次子即位，即

① 此外，小野玄妙抄录的职名录还有些较大的错误，如，将最左边的伯颜五行官衔的前四行看作是四个官员的行款，而把每行的最末几个字：“昭功万”、“奎章阁”、“扈卫”、“钦察”割裂出来，当作是人名又如，这把伯撒里与左边的撒迪两人的行款看作是一人，而把伯撒里的官衔、姓名统统列为撒迪的官衔。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看来是由于抄录者没有注意到这份题名录是自左向右排列的，而按竖行汉字的一般书写习惯，把它看作是从右向左排列了(参见《佛书解说大辞典·附录，佛教经典总论第892——893页)。

② 关于这二份职名录的考证，请参见《文史》第二十九期：方广银：《元代徽政院詹事院置废考》，《两份新发现的元代职名录考》。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载元徽政院下设机构有：“宫正司，掌谒司，掌医署，掌膳署，内宰司，备用库，藏珍库，掌仪署，文成库，供须库，仪从库，卫候司，右都威卫使司，左都威卫使司，延庆司，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马瑙玉局，大都等路诸色民匠提举司，织染杂造人匠总管府，绫绢局，织染局、文绮局，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大护国仁王寺财用规运都总管府”见《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第259页)。由此可知，愿文中未列徽政院衔名的14名官员中有不少官员也都是徽政院下属机构的负责人。

④ 《元史》卷31。

⑤ 《元史》卷114。

⑥ 《续资治通鉴》卷206。



宁宗（时七岁），逮两月，宁宗死，又立明宗长子即位，即元顺帝（时年十三岁）。顺帝初年。卜答失里“称制临朝”<sup>①</sup>，与权臣伯颜等人，操纵朝政大权，至顺四年（1333）六月，“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回回，汉人司天监寺”。<sup>②</sup>十一月，“封伯颜为秦王，锡金印。……诏秦王、右丞相伯颜，荣王，左丞相撒敦，统百官，总庶政”。<sup>③</sup>十二月，“为皇太后置徽政院，设官属三百六十有六员。”<sup>④</sup>元统二年（1334）十年，“上皇太后尊号曰：赞天开圣仁寿徽懿昭宣皇太后。”<sup>⑤</sup>三年（1335）六月，“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爰赐答剌罕之号，至于子孙，世世永赖”。<sup>⑥</sup>十一月，改元统三年为至元元年。十二月，不顾辈份的不合与朝臣的反对，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奉玉册、玉宝，上太皇太后尊号曰：赞天开圣徽懿宣昭贞文慈佑储善衍庆福元太皇太后”。<sup>⑦</sup>

然而，炙手权势，一朝倾倒。至元六年（1340）二月，元顺帝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接着又贬徙岭南，道次死于江西隆兴驿。六月，重翻明宗被害之案，撤文宗庙主，削太皇太后尊号，涉卜答失里于东安州，放燕帖古思于高丽。母子旋皆被害。<sup>⑧</sup>

前述愿文，正是卜失答里当上太皇太之后不久写的。

现在，我们转入对这部藏经本身的考证。

首先谈谈刊刻地点问题。

这部藏经的刊刻地点，看来是比较清楚的。残存僧名录共有僧人，居士23人，除未注明地址的8人外，其余15人的分布如下：

大法藏寺（今北京）	3人
大普庆寺（今北京）	2人
弘法寺（今北京）	4人
晋宁路（今山西）	2人
东昌路（今山西）	1人
真定路（今河北）	1人
袁州路（今江西）	1人
宁夏路（今宁夏）	1人

其中除袁州路在南方外，其余都在北方。尤其明了的是，在京师大都（今北京）的法藏、普庆、弘法诸寺不冠地名，则这部藏经是在北方刊刻的，具体地说，是在北京刊刻的，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必须谈谈所谓“云南刻本”与“云南棉纸”问题。如《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一文所述，最初考释这批藏经的于乃义先生认为这些经卷中部分版框大的系大都原刻，另一部分版框小的系用云南棉纸在云南翻刻。关于翻刻问题，我们在《发现》一文中已予否定，此不赘述。据我们了解，虽然目前已发现部分在云南刻的元代佛经，但都是零本，甚至直到清代，云南都没有刻过如此精湛的上千卷大部头书。说这部经是在云南刻

① 《元史》卷114。

②③④⑤⑥⑦ 《元史》卷38。

⑧ 《元史》卷40。



的,比较牵强。至于纸质问题,清代云南刻本,用纸大多薄如蝉翼,装订成册后,从前页隐约可见后页文字。明代用纸略厚,类似贵州皮纸。元代的另本佛经,纸质与这批元藏也不类。倒是有些明中叶朝鲜、日本的用纸,与这批元藏的用纸类似。因此,说这批经用的是云南棉纸,亦值得斟酌。

此外,职名录中所列伯颜等人,大都为当时的显贵,也有不少徽政院及其它的具体办事人员。徽政院设在大都,这些人员当时亦都在大都,不能设想,刻经地点会是远离大都的其它什么地方。那么,这部藏经是在大都的什么地方刻出的呢?《元史》卷二五,仁宗延祐元年(1314)二月,载:“立印经提举司”。<sup>①</sup>但是,《释氏稽古略续集》卷第一“佛智法师”条下提到:该法师曾“译中国未备显密诸经各若干部,辞旨明辩。……所译之经,朝廷皆刊行”。<sup>②</sup>佛智法师虽死于延祐元年十月,但他从世祖时就开始译经,另外,我们知道世祖时曾补雕过《金藏》,则似乎在上述《元史》所载的印经提举司成立之前,大都已有一个官方的刻经机构。也许这个印经提举司是在原官方刻经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那么在元文宗、顺帝时代这个印经提举司是否还存在?我们考释的这部元代官藏是否也出自该印经提举司呢?由于职务录中没有这个提举司的执事人员,故这个问题尚难断定。但是,据清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万寿寺”条引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先是,京师有番经,汉经二厂,年久颓圯,穆皇帝重修未竟,上移置汉经於此中(指万寿寺)”。<sup>③</sup>也许这儿所说的“年久颓圯”的蕃经,汉经二厂正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官办印经机构。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机构从元代中期一直存续到明朝,那么,我们考释的这部元代官藏不会与这个机构没有关系。

关于这部经究竟是什么时候雕造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元史》上的一些记载来窥其大概。《元史》卷二十四载,至大四年(1311)二月,“罢运江南所印佛经”。<sup>④</sup>则此前,北京所用佛经系从江南运来。《元史》卷三十三载,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命江浙行省印佛经二十七藏”。元代崇信佛教,《元史》上有关佛事的记载不绝于书,但提到印经的仅此两条。这两条记载可以证实两个问题:一是在当时,元大都无一副可资利用的经板。二是我们所考证的这部元代官藏,当时即使已开雕,亦尚未足资用。

关于第一点,我们还可以再提出一条佐证。大家都知道,元代初年,大都虽有由金入元的《金藏》板片,但当时这副版片已残缺不全。故有“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sup>⑤</sup>及“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sup>⑥</sup>之说。这部藏经当时是补雕了,但看来其后不久,由于某种我们现在尚不清楚的原因,它绝版不传了。事见宿白先生《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所引大德七年(1303)立石之阎复的《胜因寺碑》:

“大头陀教胜因寺,圆通玄悟大禅师溥光所造也。……至元(十八年)辛巳赐(溥光)大禅师之号。……圣上御极之初,玺书赐命加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

① 《元史》第563页。

② 《大正藏》卷49·910C—914A。

③ 《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18页。

④ 至大为武宗年号,但武宗已于是年元月逝世,此时系仁宗秉政。

⑤ 《大正藏》第29卷,第724页B。

⑥ 《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180页A。

夫，掌（头陀）教如故，宠数优异，向上诸师所未尝有。……初闻藏经板木在浙右，且多良工，遣法弟空庵普照门人宁道迂取经于余杭普宁寺，……”。

大都的一个被皇帝“宠数优异，向上诸师所未尝有”的大禅师，印一部佛经还需远到余杭，这不说明我们前面所说的，当时的大都根本没有一部可用的佛经板片这一结论完全可以成立吗？<sup>①</sup>

至于第二点，那更是不证自明的。不能设想，大都明明闲置着一副雕工精良的板片，却偏要千里迢迢跑到江南去印经输京。

由此，我们认为，把这部元代官藏的雕造上限定在文宗天历三年（1330），也许是比较稳妥的。

至于雕造下限，太皇太后愿文上的日期是至元二年（1336）四月。从职名录上看，撒迪的官衔是“银青荣禄大夫御史大夫”。查《元史》，撒迪的“御史大夫”一职正是至元二年四月庚寅（1336年农历4月14日）封的。则似乎把雕造下限定在该年四月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仔细审察，也有些许疑问。前面提到，日本发现的职名录与云南图书馆所藏的职名录略有不同。前者有伯撒里其人，排在撒迪的后面，而后者无其人。前者有李罗，当时是：“资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而后者李罗的官衔为：“光禄大夫徽政使领甄用监中书平章政事虎符提调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八赤吉儿千户所达鲁花赤”，且排位由第九位升到第三位，正好顶替了伯撒里的位置。查《元史》，元统三年（1335年，即至元元年）五月，伯撒里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此后一直再没有露过面，直到伯颜篡位后，才重新复出，后并封为太师，位极人臣。而李罗当“中书平章政事”的最早记载，都在至元二年七月条<sup>②</sup>。逮至伯颜被黜后，李罗亦不再见载于《元史》。这一人事变动的背景如何，对我们所考证的这部元藏的影响如何，此处暂且不予深究，起码这部元藏的雕造下限究竟是否为至元二年四月，还是可以再加探讨的。不过从《元史》看，伯颜在至元五年（1339）五月被封为大丞相，加元德上辅功臣之号。<sup>③</sup>这一点在职名录中没有反映，可见无论如何，雕造下限不会迟至至元五年。在没有更充分的史料前，我们认为还是把下限定在至元二年为宜。

如上所述，这部经的雕造上限为天历三年（1330），下限为至元二年（1336），前后共经七年。这就有一个疑问，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可能完成这么一部六千余卷的大藏经吗？我们认为是可以的。理由如次：

一、这部藏经是官藏，以国家之力，刊刻一部大藏经，七年的时间不算少了。清《龙藏》全藏7168卷，规模比这部元藏还大，它从雍正十三年（1735）开雕，至乾隆三年（1738）完工，前后只用了四年，此可为佐证。

二、据《元史》卷三十八载，元统二年（1334年）四月，“中书省臣言：佛事布施，费用太广，以世祖时较之，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三锭四十两，缗帛六万一千六

① 引文见《现代佛学》1964年第2期第22页。宿白先生认为这段记载说明《金藏》流传面不广，也许仅限于赐印，故连溥光这样的大和尚也不能请印。笔者认为证之《元史》的上述记载，似理解为其时《金藏》版片已不在或已不能用，更顺理成章些。

② 《元史》卷三十九：至元二年七月，“乙丑，中书平章政事李罗徙宅，赐金二锭，银十锭”。

③ 《元史》。



百余匹，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余锭”。如此巨额支出，是否与当时正在着力赶雕大藏有关呢？

三、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这部元藏很可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元代早有刻藏之意，《至元录》之编纂，可为其先声，但其后事未果。嗣后，英宗至治初年，曾拟刻一铜板大藏经。这部铜板大藏经是否实际开工雕造，是否完成，虽不可考<sup>①</sup>，但确实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据《续补高僧传》卷一，《法祯传》载：“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徵选天下名僧六十员警校，师与湛堂，西谷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sup>②</sup>《大明高僧传》卷一，《性澄传》载：“释性澄，字湛堂，……至治辛酉，（即至治元年，岁次辛酉，1321年——引者）驿召入京，问道于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事竣，辞归。特赐金襴衣”。<sup>③</sup>则英宗时已将拟刻之藏经校订完毕，编为新录。但英宗在位仅三年被弑，嗣后泰定帝即位，只五年而亡，雕印大藏的工作恐一直未能正式进行。但校好的底本，编定的经录，想必留存着。逮至文宗即位，再行开雕藏经，自然一切都较顺手，费时亦不需很长了。

最后，谈谈刊刻这部藏经的发起人。

在前述太皇太后愿文中，只讲是“施印三十藏”，没有提及刊刻，那么，是否卜失答里仅限于施印，未曾发起刊刻呢？刊刻发起人又是谁呢？我们认为，刊刻发起人就是这位太皇太后，理由如次：

（一）从职名录看，专司太后事务的徽政院为这部经组织了庞大的班子，以伯颜为首，包括了许多当时的显贵，还有一些是一般办事机构的具体负责人，如果仅仅限于施印三十藏，似乎根本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

（二）僧名录上的僧人，显系参与刊刻的校对入，如仅系施印，则只需按现有经板印刷即可，不需校对僧。既有这么多僧人参加校对，可见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刊刻。

（三）前面我们探究了这部藏经刊刻的时间，地点，在当时、当地、能够调动组织起伯颜等一班人，承担起刊刻发起人这一角色的，只有这一位太皇太后。

（四）文宗弑明宗自立后，心中一直充满了悔恨，这一点可由他临终遗言得到证实。而卜失答里也同样如此。故此她坚守文宗遗命，排除干扰，坚持立明宗之子为帝。在文宗时代，夫妇二人大兴佛事。恐与他们想要赎罪的思想不无关系。则他们想借刊印大藏经的积德消灾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这部藏经是由卜失答里发起刊刻的，应是没有多大疑问的。想必这部藏经也一定附有《刻藏缘起》一类的文章。如果这一文章以后能够发现，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上面，我们对这部藏经的刊刻的地点、时间，发起人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过去这部藏经从未经著录，虽然我们查阅了不少正史、野史、方志、笔记及佛教史籍，但均未找到有关的直接的证据，故以上考证，大抵依据间接材料进行，有些问题还仅只是个大致

① 英宗在位三年（1321—1323）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铜板藏经恐不易完成。

② 《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七套第一册第26页。

③ 大正藏，卷50页，第902页C。



的推断,未能得出确凿的结论。也就是说,只是尽我们所能汇集一些有关资料,提供某些参考意见,我们寄希望于将来新的资料的发现。寄希望于同行们的共同努力。

《元代官刻大藏经》与《至元录》及历代藏经千字文编次比较表

藏经卷名	元官藏	开宝	契丹	崇宁	毗卢	圆觉	资福	赵城	磧砂	至元录	普宁	备注
第九号	麟三	潜	羽	潜	潜	潜	潜	麟	潜	麟	潜	
第十号	始一	龙一字	师一乃	龙一字	龙一字	龙一字	龙一字	翔一文	龙一字	鸟一袋	龙一字	始在其中
第十一号	汤十	伐	伐	伐	伐	民	伐	民	伐	股	伐	
第十二号	道五	股	/	股	股	股	股	发	股	问	股	
第十三号	道七	股	/	股	股	股	股	发	股	问	股	
第十四号	拱六	位一有	让一陶	位一有	位一有	位一有	位一有	推一虞	位一有	陶一吊	位一有	拱不在其中
第十五号	恭九	木	/	木	木	木	木	草	木	常	木	
第十六号	器六	器	欲	器	器	器	器	覆	器	覆	器	
第十七号	欲四	欲	难	欲	欲	欲	欲	器	欲	器	欲	
第十八号	作四	/	/	/	/	/	/	说	晋	念	/	
第十九号	堂四	男	/	男	男	男	男	洁	男	祸	男	
第二十号	事一	/	侠	惑	惑	阿	阿	肥	阿	君	阿	
第二十一号	川三	/	八	/	/	/	/	铭	/	/	/	
第二十二号	友四	卑上和	/	卑上和	卑上和	卑上和	卑上和	尊卑上	卑上和	箴规仁	卑上和	
第二十三号	切一	下一随	/	下一随	下一随	下一随	下一随	和一妇	下一随	慈一弗	下一随	切不在其中
第二十四号	仁七	外	/	外	外	外	外	随	外	离	外	
第二十五号	亏六	/	/	/	/	/	/	/	/	动神	/	
第二十六号	物七	谷	传	谷	谷	谷	谷	空	谷	爵	谷	
第二十九号	密二	/	/	/	/	/	/	肆	/	勿	/	
第三十号	密五	/	/	/	/	/	/	肆	/	勿	/	
第三十一号	鸡八	内一承	/	内一承	内一承	内一承	内一承	左一明	内一承	土一何	内一承	鸡不在其中
第三十二号	治一	/	/	多士是	多士是	/	/	/	/	/	/	

说明:

(一) 这批元藏残卷在历代藏经中相应的千字文编次,据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未刊稿)所载录。

(二) 本表编号指《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一文表(一)所载各经的编号。

由于第一号至第八号经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历代诸藏编在藏首,编次相同,无比较价值,故略去。第二十七号、第二十八号两经经名尚未判定,故亦略去。

(三) 《契丹藏》的千字文编号系据房山云居寺石经辽刻本千字文编号录。

# 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

龙 晦

佛教文学，特别是俗文学，影响较广。本文作者试图从佛教不同宗派的思想分类，对敦煌词曲加以研究，以探索它们如何利用作品宣传其教义，剖析其在民间进行的活动。本文所涉及的宗派为禅宗和净土宗。在禅宗作品的研究中，文章探讨了神会和真觉的作品，以及据标题或内容可断为南宗作品多种，另外还讨论了绝无仅有的几首北宗作品，认为北宗作品在数量，质量及写卷多少上均远逊于南宗，反映了南宗之发达超北宗，这与一般佛教上的反映完全一致。在净土宗作品的讨论中，分析了法照的词曲，释智严的《大十二时》以及作者无考，但据内容可断为净土宗的作品。净土宗重视民间演唱，讲求文学音乐，其词曲数目较禅宗还多。

作者龙晦，1924年生，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中国佛学的同志在从事研究工作中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从佛教的教义和哲理，佛教徒的传教事业，经籍的考证、诠释，以及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来进行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构成了中国佛教史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注意佛教徒的传教宣传品——佛教文学，特别是用较接近民间口语的俗文学，它的影响面较高僧，诗僧的作品感染士大夫远远来得宽广，影响来得深刻，而研究俗文学的同志们，又多注意佛教文学故事的结构，以及他们所用的体裁，很少从佛教各宗宗教思想分类，去研究其如何利用作品去宣传自己宗派的教义，去剖析他们当时在民间进行的宗教活动。因此“佛教文学与佛教”就成了“两不管”的空白点，而敦煌文学特别是敦煌词曲以佛教文学为大宗，更少有人从这方面进行研究，故初草成此文以就正于搞敦煌文学及研究佛教的同志们。

敦煌词曲在《敦煌歌辞总集》<sup>①</sup>中，佛教文学占了极大的比重，据统计约占四分之三。佛教词曲大多数从《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定格联章的体裁去表现，它们都是民间流行歌辞，极易琅琅上口，收到了宣扬佛教的效果。因此佛教各宗都纷纷利用它，把他们亟欲让人们知道和信仰的教义，一一巧妙地渗透在这些作品之中，我们对之进行排比研究，不但研究了佛教文学，也会从另一方面补充佛教史的不足。为了审慎处理材料，首先录列作品标明教派的，或虽未标明教派、但其作者在佛教史上所隶属的

<sup>①</sup> 见任二北先生《敦煌歌辞总集》手稿本，本文征引词曲均以任本为正，以下不另注。